

中国管理实践与比较管理理论创新

——2012 年第五届全国比较管理研讨会综述

关 鑫

内容提要 在香港理工大学举办的第五届全国比较管理研讨会,与会者就比较管理研究中的中国管理实践、本土化管理理论和比较管理理论创新进行了深度探讨。本文简要介绍了研讨会的发起、主要议题,并从比较管理学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中国本土化管理、国外管理模式比较和比较管理专题四个方面综述学者们的主要观点和思想。

关键词 比较管理 本土化 研究方法 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13)01-0122-07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世界知名的中国企业,中国管理实践或中国式管理也因此越来越受到各国学者的高度关注。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对中国式管理进行较为清晰的界定,更谈不上提炼出一种普遍认可的中国管理模式。根据前四次全国比较管理研讨会上取得的理论成果,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和比较管理理论来研究中国管理实践,进而全面解读中国式管理,提炼中国管理模式,是十分必要的。基于此,由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会主办,香港卫生经济学会、香港理工大学专业与持续教育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管理出版社等单位联合承办的“第五届全国比较管理研讨会——中国管理实践与比较管理理论创新”于2012年10月27日在香港理工大学成功召开。来自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城市大学、香港卫生经济学会、香港公共管理协会和香港创新孵化中心等港澳地区知名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教育部工商管理教育指导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南京理工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东北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湖南工业大学、汕头大学和经济管理出版社等单位的代表100余人参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理事长黄速建研究员作为主办方代表首先致辞。他指出,中国企业管理理论与方法根植于中国管理思想和传统文化,其发展与完善既需要不断学习、引进和借鉴国际先进管理经验、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同时,又要充分考虑本国国情,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他衷心

收稿日期:2012-11-1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资本视角下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与剥夺问题研究”(7107207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中国低收入群体的商业模式创新”(71072141)

作者简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北京,100070。

希望能够通过本届研讨会成功举办,进一步推动中国管理理论与中国管理学派的形成与发展。香港理工大学专业与持续教育学院院长阮博文教授代表承办方致辞。他概要地介绍了香港理工大学专业与持续教育学院的发展概况,以及学院近年所取得的重要成绩,并强调了本届比较管理研讨会召开的背景。在主题演讲环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高闯教授首先作了题为“比较管理学的学科基础问题”的学术报告,分别对比较管理学的发展历程、研究对象、学科基本属性和学科体系等进行了精彩的解读;香港理工大学专业与持续教育学院院长阮博文教授围绕“全球主要国家的医疗融资制度”这一主题展开比较分析。山东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徐向艺教授对“公司治理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做出精辟的阐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海尔集团战略变革研究课题组成员赵剑波博士分别从价值观平衡和资源再平衡两个视角系统地解读了海尔集团战略变革的艺术。在同步主题演讲环节中,与会者分别就“中国本土管理的概念和理论”、“比较管理理论研究现状、问题与走向”、“中国管理实践案例研究”、“情景化理论与实践”、“信息管理”等主题展开热烈研讨。

本届研讨会期间,学者们就比较管理研究中的中国管理实践、本土化管理理论和比较管理理论创新及相关主题展开深度探讨,他们的观点或论题大致可以分为比较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中国本土化管理理论与实践、国外管理模式比较、比较管理专题四大类。

一、比较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

(一) 比较管理的研究对象、学科属性与演化分析范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高闯教授首先围绕“比较管理学的学科基础问题”进行了精彩解读。他首先回顾了比较管理研究的发展简史,指出比较管理研究对象和边界的模糊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深刻比较“管理理论说”、“管理现象说”、“管理方式说”和“管理理论与实践说”的基础上,他强调比较管理学并不简单研究处于现象层面的管理实践活动,而是要揭示具体情境下管理现象背后的运作机制和机理,比较不同情境下管理现象背后的运作机制和机理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回答具体的、不同情境的管理活动实际上是如何进行的,有什么异同,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不同情境管理活动的差异?并借用“中层理论”诠释什么是“机制”。比较管理研究的任务就是要对其研究对象做出诠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和因果性说明(Causal explanation),因此,它是一门典型的解释性科学。高闯教授还详尽地介绍了比较管理研究中的分析方法,包括数理整合方法、案例推理、计算推演、心理行为分析、比较分析方法和历史的演化分析,并着重强调了历史的演化分析中生物进化论和钟表理论。最后,他从情境与演化的视角对比较管理学的学科体系进行了生动的说明。

(二) 比较管理研究的新方法

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李德昌副研究员基于势科学与信息人理论分析了比较管理视角下的中国文化复杂性与管理路径。他指出,管理的本质是应对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本质是系统要素之间的差别与联系营造的强大信息量或信息势而构造的管理实践的复杂性。从比较管理的视角来看,基于中国文化的管理复杂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忠孝导致的线性相关;其二,嫉妒产生的非线性纠缠。在势科学与信息人理论基础上,通过线性变换的置换对称与非线性变换的局域对称,营造强大的管理信息量与管理信息势,是应对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实现中国管理的有效路径。其中包括以下三条路径:一是倡导个性化与民主化,解决中国管理中社会结构与组织结构的非稳态意识;二是通过置换变换的制度设计和意识重建,将线性相关的同质性解构为集体主义的置换群,营造强大的管理信息量与信息势;三是通过纠结变换的组织管理和文化管理,将“关系纠缠”的内耗约束机制转变为“自组织信任”的局域对称性机制,由此营造中国管理灵活而强大的应变信息量与应变信息势。

上海外国语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范徽教授深入细致地探讨了无国界管理。他指出,无国界管理是公司摆

脱与国家之间的纽带,超越民族国家和独立区位的利益,以全球为目标,为全球市场服务,通过全球性系统决策的方法,把不同的子公司统一起来,通过全球经营网络来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和世界公民的发展愿景。政治有国界,但信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突破了国界,因而出现了无国界企业与无国界管理。他首先考察无国界企业的存在背景,然后正名无国界管理的概念,最后提出无国界管理的战略路径与实现框架,并运用这一框架深刻地剖析了摩托罗拉无国界管理价值观发展案例。

山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李枫老师以日本从美国移植全面质量管理思想的实践经验为基础进行研究,对管理移植发生的原因、移植的内容、分析的角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观点,并尝试性地提出管理移植的具体实施过程。他指出,企业管理移植的内容包括管理技术、管理制度、企业文化和管理哲学四个部分。在实践中,对管理技术的移植较多,成功案例也很多。其次,较为容易的就是管理制度的移植,它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与管理技术相连的规章制度,这些移植起来较容易;另一层是与企业文化相连的部分,这些移植起来较困难。而企业文化和管理哲学对于移植来说更为困难。因此,企业必须认真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进行科学的可行性分析。

二、中国本土化管理理论与实践

(一) 基于文化的管理创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程丽霞副教授从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视角,在论述北京大学的王建国教授提出的文化核心论产生的背景、内容及应用意义的基础上,对文化核心论与稻盛和夫的管理思想进行了对比研究。王建国教授提出的以文化为核心的六维管理理论,从六个方面讨论现代组织的管理:文化管理讨论怎样判别事物的对错,找正确的事做,以求效果;信息管理讨论怎样确定事物的客观性、可靠性,以求做真实可靠的事;知识管理讨论怎样用理性的、正确的方法做事,以求效率;艺术管理讨论管理人的艺术,使管理具有奇效和美感;权变管理讨论管理怎样适用时空和环境的变化,力求变通的做事;执行管理讨论管理的全面执行力,即文化、信息、知识、艺术和权变五个方面的执行力及其它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六维管理理论中,文化管理具有统帅的核心地位。而日本经营四圣之一、一生创办了两家世界五百强公司的稻盛和夫认为,人生/事业成功的最关键是坚持“作为人,何谓正确”的哲学,以他的成功验证了王教授文化核心论的正确性,两者的管理思想不谋而合。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张胜荣等回顾了西方管理学中经典的人性假设及对应的管理理论。他们认为,企业文化管理是管理理论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因此提出全新的人性假设,即自在人假设,将之归纳、概括为“自在、和平、大爱”。这种归纳极富时代感和创新性,具有极强的概括性和包容性,既涵盖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又汲取了东方文化的最高境界。与“自在人”假设对应的管理理论是S理论,他们进而构建了S管理理论的模型,分析了S理论模型各核心要素作用机理及理论的运用条件,讨论了自在与不自在两种状态下模型的演变,以及不自在状态下,通过搭建金三角让模型回归自在状态;最后指出S管理理论的历史意义与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湖南工业大学商学院欧绍华教授等从近代民族企业在战略环境分析、战略选择及评价以及战略实施及控制等方面的独特见解出发,探讨近代民族企业战略管理思想及其实践。他们指出,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根据企业所处的环境、所面临的困难,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对策,形成了一系列战略管理思想。其中包括:注重投资环境分析,“谋定而后动”的思想;把握时局变化、重视权变的思想;同业合并、联合经营思想;多元经营与专一经营相结合思想;组织管理思想、成本管理思想、人事管理思想和财务管理思想。

(二) 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钟耕深教授等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结合企业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不

同生命周期的特点,分别讨论了当企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时商业模式的转型和优化思路,以及应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手段。他们指出,商业模式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形式,没有哪一种模式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没有哪一种模式可以一劳永逸。任何一种成功的商业模式都是和内外环境及资源恰当结合的产物。通过对商业模式不断地动态调整,逐步加强企业应对自身发展和变化的能力,进而实现企业持久健康的发展。他们还特别强调,行业内的企业出于对成功的相互模仿,往往会出现“趋同”现象,面对“趋同”,企业需要保持足够的警惕,要敢于对商业模式进行优化和变革,改变当中的某些要素或者环节,甚至彻底地再造商业模式,以差异化经营获取超额利润。企业只有随着自身的发展和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对商业模式加以创新,才能获得持续的竞争力与持久生存。

香港城市大学 Lee Ngok 教授等对中国新兴市场的营销战略做了经验分析。他们指出,中国是一个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实践与现场经验对理解中国的市场营销战略、营销组合与服务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调研市场营销计划和战略的发展,他们采用了元分析方法,即对来自中国产品部门、金融部门和服务部门的有实践经验的管理者们的案例进行元分析。结果显示,来自中国 15 个省的案例研究各不相同,关注重点是市场而非顾客,中国的市场营销需要重新定向,管理者需要接受市场营销方面的理论、知识与技能培训。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海尔集团战略变革研究课题组成员赵剑波助理研究员系统地介绍了海尔集团由“以质量与服务为核心”的高速发展期到“以人单合一双赢模式为核心”的战略转型期的战略变革历程,并分别从价值观平衡和资源再平衡两个视角系统地解读了海尔集团战略变革的艺术。他指出,海尔价值观平衡主要包括创新与创业、机会公平和开放性,并分别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跟不上步伐,就会成为障碍”、“对创新的概念,不能有任何迟疑”、“纪律严明的部队”等词句加以生动形象的解说。海尔的资源再平衡则包括用户资源再平衡、组织层级资源再平衡和企业间资源再平衡。海尔“以人单合一双赢模式为核心”的战略转型恰恰体现了企业价值观平衡和资源的再平衡。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余镜怀副教授等基于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垂直行业 B2B 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现状,选取 3 家具有代表性的交易市场运营商作为案例样本,开展多案例分析比较,归纳出中国原材料行业垂直行业 B2B 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运营商从信息服务到交易服务,再到其他增值服务的资源整合的一般发展规律,为中国规范相关市场提供政策参考。他们指出,大宗商品交易在中国流通市场,特别是原材料行业垂直行业 B2B 交易市场更发挥着重要作用。垂直行业 B2B 电子交易市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立足于市场运营主体的原有优势。垂直行业 B2B 电子交易市场遵循信息服务—交易服务—金融等增值服务的发展模式。目前,垂直行业 B2B 电子交易市场都还没有实现整个供应链的资源整合服务模式。包括钢铁网、兰格钢铁和金银岛都没有覆盖到物流配送等领域,主要通过与第三方物流公司合作。因此,资源整合的原材料电子交易市场应该是所有垂直行业 B2B 电子交易市场发展的成熟阶段,可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电子商务解决方案,实现贸易的每个环节上的资源整合,是垂直行业 B2B 电子商务未来发展的趋势。

三、国外管理模式比较

(一) 中国与其他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管理比较

香港创新孵化中心 CEO 周志文先生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管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比较。他指出,近十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的发展已经成为提升各国综合竞争实力的首要战略。文化创意产业不仅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而且更能提升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积极形象与影响。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内地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还处在发展初期。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公司和学术界间的通力合作。他分别对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韩国、英国和美国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决定因素和政府政策

影响进行系统讨论与深刻比较,在此基础上,描绘了中国内地文化创意产业的特征和商业模式,并特别强调了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建立与复制。最后,他还提出一些对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较高借鉴价值的政策建议。

(二) 全球医疗融资模式比较

香港理工大学专业与持续教育学院院长阮博文教授围绕“全球主要国家的医疗融资制度”展开比较分析。他根据构造的医疗融资方程式,分别从税收、社保、用者自付、医疗储蓄账户、私营保险、捐款、价格和数量8个维度系统、翔实地分析和比较了英国模式、德国模式、美国模式、新加坡模式和混合模式。据此,他提出了以私营为主导的“X模式”和以公营为主导的“Y模式”,构建了医疗系统光谱,并运用A(选择、创新、高素质和高效率)和B(公平和社会团结)两种价值观来评价“X模式”和“Y模式”。此外,阮博文教授还从医疗总开支与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婴儿死亡率、男性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公共医疗开支占医疗总开支比重、以每千人计算的病床数和以每千人计算的持证医生数等几个维度对美国、英国、德国、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融资效果进行考量与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以下重要研究结论:系统的目标要先定清楚,证据显示“X模式”不一定比“Y模式”贵,健康指标与开支和系统类型没多大关系,医疗开支与收入关系强,系统的细节是最重要的,政府的协调是非常重要的。

(三) 企业监管体制与信息公开比较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徐炜副教授首先分析了美国国有企业及美国联邦政府企业,进一步分析了美国联邦政府企业具体的三种类型:联邦政府公司、政府发起企业及临时性的政府控制公司。他进一步从联邦政府公司的性质、特点、监管的主体及内容等方面研究了美国联邦政府公司的监管体制,结果发现:(1)美国联邦政府公司是一种特殊的企业;(2)美国联邦政府公司数量少;(3)美国联邦政府公司多以董事会治理为主;(4)美国形成了对政府公司比较完善的法律和预算监管体系。相应地,他提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四点建议:(1)目前的国有企业应实行分类改革;(2)中国各级政府国有企业数量应逐步大幅度减少;(3)对II类国有企业继续推进以董事会治理为主的国有企业治理模式;(4)对I类国有企业(政府公司)完善对国有企业监控的法律体系及预算管理体系。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范合君副教授以微软公司为例,对纵向一体与纵向分离下核心部件最优信息公开度进行比较分析。他指出,应用软件必须接入操作系统才能正常的运行。微软公司在操作系统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而在应用软件市场上处于竞争地位。纵向一体化的微软公司公开操作系统的部分接口信息会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会在竞争性应用软件市场引入竞争对手降低本公司应用软件的利润;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应用软件种类的增多消费者对操作系统的评价也会提高,微软可以提高操作系统的价格。因此,微软必须对二者进行权衡。他运用经济学模型加以解释和分析,并得出了纵向一体化情况下微软也会公开所有操作系统信息的结论。

(四) 国际连锁超市营销模式比较

安徽财经大学王娜老师分别对沃尔玛、7-11、屈臣氏三家零售企业的连锁超市经营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她指出,沃尔玛、7-11、屈臣氏三家零售企业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连锁超市经营模式。它们的零售业态和诉求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经营哲学不同、目标顾客群不同、定价方法不同、基本竞争战略不同、主要促销手段不同。同时,它们之间也隐藏着一些相似之处,例如,超市品牌特色的准确定位,以客为尊的企业文化,自有品牌彰显活力。她通过对比和例证的手法,阐述了三家零售企业为何营销模式迥异却同样成功,并指出它们各自都不乏实力雄厚的竞争对手,除了专注于自己的品牌经营特色,还要进一步规范企业行为,坚守诚信之道。

四、比较管理专题

(一) 公司治理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徐向艺教授简要地回顾了从股东单边治理到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演进过程,并指出两种治理模式的缺陷,提出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他指出,以股东为主导的核心利益相关者相机治理理论不仅克服了股东至上、单边治理的局限,也避免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所主张的全员参与治理所引起的目标混乱、效率低下等问题,是对单边治理与共同治理的修正与整合。他还分别对公司治理结构与治理行为间的差异、公司治理绩效与财务绩效间的关系以及公司治理的跨期效应等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他特别强调,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应表现为履行公司使命,实现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均衡、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等方面的效率,即公司治理效率。对公司治理效率进行准确界定与测度,是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合理安排与设计的逻辑出发点。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存在的最终目标应是解决两权分离导致的代理问题,即公司治理代理问题的效率。公司治理绩效即可能是本期公司治理改进的结果,也可能是前期公司治理改进的结果。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表现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较短的样本期间无法检验出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孙丽教授重点分析了现代日本企业面临的紧迫性问题以及具有尖端性的企业治理问题。她主要针对下述问题再次展开探讨:外国投资者的增加和互相持股方式解体的原因和归结、主银行体系解体后的状态依存型治理的重建方向、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的互补和替代关系的解析、构成企业治理的各种辅助制度之间的互补性(Complimentarity)。通过分析,总体弄清市场层面机制和关系层面机制结合起来的复合型日本企业治理的实际状况,明确了金融危机后日本公司治理重建的重点应是根据不同类型的企业设计不同的解决方案。同时,她还分析2008年秋季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给日本企业治理的进化带来的影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关鑫老师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中国上市公司终极股东的控制原理进行了深刻解读。他指出,公司治理的核心就是对控制权的争夺。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第二类公司治理问题——终极股东控制与剥夺问题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然而,在复杂的公司治理实践中,单单依靠“股权控制链”分析范式难以克服终极股东的隐蔽性问题,并且还会造成实证分析结果和研究结论与现实世界发生背离。“社会资本控制链”的引入将有助于解决此类问题,并引领终极股东控制问题的研究回归真实世界。在对终极股东控制权及其社会资本进行了清晰界定的基础上,他系统地分析了终极股东社会资本对控制权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以信任和各种形式社会连带为核心的终极股东社会资本,不仅帮助其有效地节约和缓冲了与诸多控制权相关方之间的交易费用,还顺畅了它们之间信息交流,增进了它们彼此间的沟通了解,促进共同愿景的建立,并进一步增强它们在决策与行动过程中的一致性,由此持续获取和强化对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剩余控制权、决策控制权以及经营控制权,最终实现其终极控制目标。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徐宁等对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控制权激励双重性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她指出,控制权激励是一种重要的高管隐性激励契约,但其在本质上具有双重性。授予高管控制权能否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产生影响?影响方式如何?基于创新经济学相关理论,她运用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高管控制权激励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由技术创新投入能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技术创新转化能力三个维度构成;控制权激励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即当控制权激励达到极值之前,控制权的积极性使其对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产生促进效应,但超过此极值,控制权激励的消极性凸显,对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具有抑制效应。因此,保持适度的控制权激励力度、并对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进行合理配置是提升上市公司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理论选择。

(二) 人力资源管理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王益民教授等将组织双元性的研究延伸到战略领域,探寻组织战略双元性的内在逻辑及其作用机制,然后实证考察了高层管理团队(TMT)特征对组织战略双元性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他们基于127份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团队的行为整合、社会资本(商业联系、政治联系)、中庸思维对战略双元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环境动态性显著增强了行为整合、中庸思维与战略双元性之间的关系,而环境复杂性显著弱化了行为整合、中庸思维与战略双元性之间的关系。探索了不同于西方情境下的中国高层管理团队特征及其对本土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崔佳颖副教授对荐举制度与考试制度在人才选拔中应用进行比较研究。她指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可划分成荐举制度和考试制度两类。这两种选拔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前者荐举制度是由最高统治者或高级官员推荐官员的制度,重视推荐考察;后者科举制度是通过分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侧重因试取人。这两种选官方式又有相互交叉,比如荐举制度中也有考试因素,科举制度中也有些荐举因素。在隋至清末的1300年间,科举考试共历经了6次废除,各朝各代的统治者在选拔人才时,不断地在荐举与考试制度之间反复实践。本文剖析科举考试兴废的原因,从人才选拔的视角比较科举考试制度与荐举制度的差异,能够对当代的人才选拔有所借鉴。

(三) 其他

香港理工大学邱张汉琴教授对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投资战略的决定因素做了深入探讨。她指出,中国的酒店业从1978年的137家激增至2009年的14237家,驱动这种快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的扩张。通过对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投资战略及其决定因素的分析,她发现,在中国东部地区,影响跨国酒店集团投资的关键因素包括市场需求、以游客量和旅游花费计算的市场规模,以政策、大型活动等虚拟变量来衡量的商业环境。在中国中部地区,影响跨国酒店集团投资的关键因素包括游客消费额、外商投资额、人均GDP和政策问题。而在中国西部地区,影响跨国酒店集团投资的关键因素是外国游客的数量和外商投资额。她特别指出,这些关键因素的影响程度因受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制约而有所不同,因此,跨国酒店集团在华投资战略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以上因素。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徐光毅助理研究员等对国际汽车品牌在中国市场的溢价能力进行分析。他们指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车消费市场,外国汽车制造商都渴望抢占先机,在这一巨大市场获得相应的份额。他们以价格在市场经济中的信号作用为基础,探索设计了一种溢价能力评估体系,并尝试使用这一体系对国际汽车品牌在中国市场(包括内地地区及香港特区)的溢价能力进行比较分析,旨在为中国顾客进行汽车购买选择,以及为全球汽车制造商进一步了解中国消费者购买能力与行为模式,提供实证分析及策略参考。他们还特别建议中国自主厂商和合资厂商也能够从目标市场定位、品牌强度、权衡税费和独特与垄断四个方面入手,创造属于自己品牌的独特优势。

本次研讨会以“中国管理实践与比较管理理论创新”为主题,强调从比较分析视角研究中国管理的实践问题,同时倡导研究比较管理学的学科基础理论问题,为深度探讨多元化的研究范式、寻找合适的分析工具,搭建较为系统、科学的比较管理学科体系框架提供一定的基础,并以比较管理视角推动管理中国本土化研究。本次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必将引起更多专家学者们的共鸣,集思广益,为不久的将来,在中国出现“比较管理理论丛林”,建立起真正的“中国管理学派”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齐晓飞